



DUWEI JIAOYU SIXIANG
ZAI ZHONGGUO

Jinian Duwei Laihua Jiangxue 100 Zhounian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

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周年

张斌贤 刘云杉 ◎主 编
王 颖 涂诗万 ◎副主编
李福顺 ◎绘 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

——纪念杜威来华讲学 100 周年

张斌贤 刘云杉 主 编

王 颖 涂诗万 副主编

李福顺 绘 图

本书分工如下：

- 第一章至第三章 王 颖(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第四章 涂诗万(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第五章至第六章 涂诗万
第七章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第八章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第九章 刘周岩(《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第十章 尹 超(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第十一章 查尔斯·阿贝尔曼(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第十二章 李福顺(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理事长)
王 颖 涂诗万
附 录 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杜威来华讲学 100 周年/张斌贤，刘云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7-301-30409-9

I. ①杜… II. ①张…②刘… III. ①杜威 (Dewey, John 1859—1952)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6159 号

- 书 名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杜威来华讲学 100 周年
著作责任者 张斌贤 刘云杉 主编
责任编辑 于 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40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科学与艺术之声（微信号：sartspku）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67346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420 千字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序 言 |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对这些教育思想及其影响做何种评价,无可否认的是,在所有这些教育思想中,杜威(John Dewey)教育思想影响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都难以相比的。

同样难以相比的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之跌宕起伏。大体上,这个曲折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神圣化”。1919年后,随着杜威为期两年多的讲学以及克伯屈(W. H. Kilpatrick)、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等人的相继访华,由于蔡元培、胡适等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领袖的推崇,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盛行一时,杜威成了中国教育界崇拜的偶像。1949—1976年为第二阶段,“妖魔化”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杜威及其教育思想从“天上”跌入“地狱”,成为严厉批判甚至诅咒的对象,尽管参与批判的人未必深入研读过杜威的著作。近四十年来为第三个阶段,学术化和“庸俗化”混杂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从1982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西安年会后,中国教育学界开始重新将杜威教育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四十多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认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在另一方面,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仍不尽如人意。研究进展有限,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分量不重、质量不高,除少数成果外,研究的视野狭窄、主题单一。其中原因无非是,第一,对杜威著作的完整和系统的阅读不够,这从许多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就能看得非常清楚。指望仅仅阅读(哪怕是非常深度的阅读)几种杜威的著作,就能形成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二,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了解不充分,不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开展新的研究,所以难以在既有研究所形成的平台继续提升,难以出新。其实,虽然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始终不热不冷,但在美国等国,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形成了全新的研

究格局。^① 所以,并非无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借鉴,而是研究者没有花费功夫去掌握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这两个原因背后的原因则是国内教育学界缺乏杜威教育思想的专业研究人才。迄今为止,大多数曾发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将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作为临时的学术兴趣,前期缺乏系统积累,后期又无完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短时期内获得显著的进展确实是一种奢望。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广泛地反映在大量对外国教育和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学术研究进展缓慢推进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更为有害的将杜威教育思想庸俗化的趋势。所谓“庸俗化”是指,一些论者或是根据道听途说,或是出于望文生义,把杜威教育思想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以为从杜威教育思想中能寻找到各种“启示”。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场景”:杜威思想“对高职实践教学的启示”,“对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的启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启示”,“对教育技术实验研究的启示”,“对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对职教工作的启示”,“对新时期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启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对‘生涯辅导’的启示”,“对环境道德教育的启示”,等等。杜威教育思想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育中的任何工作似乎都能够从杜威思想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如果论者真的是通过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从杜威的“微言大义”中发掘出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发现前人所未发现,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事实是,诸多所谓的“启示”并非来自论者对杜威著作的深入解读,而是以杜威的言论注解作者的“意见”。而诸多“启示”其实与杜威教育思想毫无关系,或与杜威教育思想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启示”恰恰是杜威所反对的。只要有一些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怎样解读杜威的著作,都不可能从中获得那些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有用的“启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看似将杜威教育思想“偶像化”,实则导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娱乐化或庸俗化。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状况的基本途径,就是要提高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水平,使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项专业工作而非文化消费。

今年是杜威访华100周年,我们特编写《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周年》。

^① 涂诗万. 美国近二十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J]. 教育学报, 2012(2).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作者队伍的构成。其中,既有石中英教授、刘云杉教授等理论功底深厚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学者,又有王颖博士、涂诗万博士等受过良好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尹超校长和阿贝尔曼(Abelmann)先生等中美两国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小学校长。

由于作者构成的特色,也就有了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本书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角度梳理、分析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认识视角。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详细梳理了国内外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从而为有志于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南。

本书的第四个特色是艺术家李福顺先生根据史实资料和重走杜威讲学之路,绘制了20幅杜威讲学图,从而图文并茂地为读者了解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途径。

张斌贤

2019年2月

| 导 言 |

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和民主共和国观念的逐步深入,中国传统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动摇,出现了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需求。而各种政治势力轮番登场,政局频繁变更,既客观地决定了中国教育难以自觉实现现代化,需要外力推动,也为这种外力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民国初年世界各种思潮特别是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外在推动力,冲击了中国政治文化甚至教育领域。“五四”时期这种由西方而来的民主科学思潮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以民主科学为特征的现代化在中国产生,此时以提倡民主、科学为职志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入中国,因其具有的开放性以及提供的广阔思考力,适应了中国教育求变、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国文化、知识、教育界掀起了研究、实践杜威思想的热潮。

就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与杜威思想之关系而言,涉及面颇广,持续时间也较长。本书试图将论域稍作限制,注目于这样一个教育现象:“五四”时期,一批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的中国学生在杜威来华前后形成了杜威教育学派,他们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大力宣传推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力图建立美国式现代教育体系。最初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主要借用与杜威之关系、借用杜威之名来阐述他们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后来随着杜威在华讲学的广泛深入,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派代表人物孟禄(Paul Monroe)、柏克赫斯特、克伯屈等来华讲学的影响,他们不断深入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并进行一定的现代教育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虽然以后因为政局不稳,也因为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出现了分野,但他们依然在不同方面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实践。有鉴于这批人一直在理论上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践行杜威的思想,我们将其称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他们与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则成为本书研究的主题。

研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关系这一主题,我们将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对这一新注目到的论题进行界定,讨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的条件;其次,要以问题为中心阐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思想及

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最后，分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普遍性。具体而言，我们在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时，抓住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辨析和澄清他们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指出他们是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赞同、继承了杜威的观点，又是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杜威相异、发展杜威的思想，并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

在研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思想之关系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切入层面。从思想来源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除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外，他们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留学经历可以反映出他们与杜威的关系。从文化教育的传播方面看，杜威在美国以及在华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影响以及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对杜威思想的传播，这之间有一定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文化相容性，探讨文化传播机制及成因，将阐述出两者的关系。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发展方面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作为实用主义思想的分支，在中国形成了一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开展了各种实用主义教育活动，对中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实践活动的研究，也将明确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之关系。从现代教育角度看，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掌握并运用了杜威思想中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并且杜威在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现代教育思想方面。鉴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以及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动，本书主要从现代教育思想这一角度来探讨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现代教育思想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作用。

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到制度再到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精神被认为是现代化也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在民主科学之下，现代教育的具体内涵指哪些却有诸多疑义。作为现代教育的开创者，杜威曾在《经验与教育》中对与传统教育相对立的进步教育做了简要的说明：“以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以从经验中学习，反对从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以获得为达到直接需要和目的的各种技能和技巧，反对以训练的方法获得那种孤立的技能和技巧；以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反对为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做

准备；以熟悉变动中的世界，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①

尽管杜威现代教育思想不等同于其进步教育思想，他的这段论述也不能代表其全部的教育现代化思想，但他思想中的进步教育与现代教育有着基本的一致性与重合性，杜威这种有关进步主义教育的思想，长期以来也被教育史界看作是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本书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思想关系时所指的现代教育就是杜威的现代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也是我们辨析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代表人物思想的出发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不约而同围绕着杜威现代教育理论开展现代教育实践，并提出重视个性教育、鼓励自治、提倡教育与生活相联系等思想。

将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看作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解析他们与杜威思想的关系，对我们研究现代教育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是推动杜威现代教育思想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文化载体。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走的是美式道路，美国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新学制改革，学校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都受到杜威的影响。杜威在现代中国教育的位置如此重要，影响如此之大，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推动有直接关系。正是凭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这一载体，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才变得更深远、更广阔。也正因为这一载体，学术界仍有许多一脉相承的思想，使得杜威思想至今仍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现在，将来中国也还会有欣赏、传播杜威思想的人，他们对杜威思想的传承、发扬，将指导中国的教育思想实践。因此，研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将有助于探讨杜威现代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作用来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影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中国杜威教育学派领导制定的1922年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础；他们推行的白话文教学，开展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推动了中国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的发展；他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开创了现代中国教育实验先河。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对现代教育有如此重要的贡献，已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从当今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来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强调的生活教育内容、注重行动的教学做合一方法、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等，是现代中国教育教学的楷模，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一再被实验推广，他们的思想实践也一直广为研究传诵并被制度化，并成为历次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

^① [美]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M]. 赵祥麟, 王承绪, 编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347.

研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将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目前我们的教育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旧的思想、旧的制度常常阻碍我们教育的发展,研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将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思想、继承中国近现代教育精华提供方法论意义,使我们以智慧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教育。

毋庸讳言,本书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尝试。在浩瀚的史海中努力拓宽相关史料的覆盖面,全面把握现代教育家的思想实践,正确看待他们的改革实践、改革影响、改革效果,都是极不容易做到的,本书作为研究中的沧海一粟,希望能为中国现代教育的研究与发展尽微薄之力。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概况	(1)
第二章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的基础	(30)
第三章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	(46)
第四章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165)
第五章	行行重行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中国	(184)
第六章	重新发现杜威:中国近二十年杜威研究新进展	(199)
第七章	杜威教育哲学论述的方法	(221)
第八章	兴趣的限度:基于杜威困惑的讨论	(233)
第九章	品格如何培植?北大附中“书院制”的探索	(263)
第十章	怎样建设教与学的“实验室”——北大附小的“生命课堂”实践 ..	(303)
第十一章	与杜威先生的跨时空交流:开启实验学校的 2.0 时代	(323)
第十二章	杜威在华讲学图	(333)
附录一	杜威在华讲演目录	(374)
附录二	杜威著作及中译本(1949 年前)目录	(378)
参考文献	(382)
编后记	(392)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概况

王 颖

20 世纪前半期是中国文化、教育异彩纷呈的时期,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路:或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从事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一类工作。……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们所谓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①。

也就是说,在“五四”运动之后,除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救亡运动要得到肯定外,另一群从事文化、科学教育的工作者,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在这一时期,有一群可以说是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建立中声名显赫、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年留学美国,深受欧美教育思潮、教育实验影响,回国后致力于用他国先进思想改造中国教育落后之面貌。这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业于杜威,回国后宣传改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之适用于中国。他们每个人在中国历史、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中国教育发挥了超越每个人限制的作用。可以说,这一群体因每个人的影响而增加了群体的影响力,而每个人又因这一著名的群体发挥了更大作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一群体是如此独特,影响如此广大,可以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派。

鉴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师承于杜威,在学术上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理论实践中践行杜威的教育学说,我们将这群人组成的团体称之为中国杜威教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282.

育学派，他们包括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李建勋、张伯苓等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对于这一称呼，目前国内尚无此说法，不仅如此，国内对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也不多，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胡适、陶行知与杜威关系的研究上。实际上，胡适、陶行知是杜威的中国弟子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我们研究最广泛的人。其他如陈鹤琴、李建勋、张伯苓等，学术界多放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以及具体的办学经验上，很少考虑他们与杜威思想的渊源。陈鹤琴、李建勋、张伯苓等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访学研究，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杜威对他们的教育思想实践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如陈鹤琴的“活教育”，李建勋的教育行政、教育调查，张伯苓的允公允能、学行合一、手脑并用思想等都受到杜威影响。只是因为杜威、胡适等曾在中国处于尴尬的位置，我们忽略了研究他们思想的一脉相承性，但实际上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广泛。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其他人物如郭秉文、蒋梦麟等，因历史问题我们研究得更少。郭秉文、蒋梦麟直接受业于杜威，在民国教育领域内甚具影响力，郭秉文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在位期间，引进了大量留美学生，并进行学术改革。蒋梦麟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离任北大校长后，几次接任北大校长职务，进行办学改革。郭秉文、蒋梦麟是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物，但由于社会的影响，也由于他们很早离开大陆去台湾，对这二人教育思想以及作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人物，我们研究得并不多。此次我们从学术史角度，对 20 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这些我们以往研究不够的教育家及他们的思想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一、 学派形成的基本条件

对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这一称呼，由于前此未有，我们不得不论证其成为学派的理由。

“学派”在《辞海》的界定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陈文林、邹甲申主编的《自然辩证法词典》对学派的界定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术师承不同，由学术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批科学家所形成的派别。科学上不同学派的争论，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界定学派为：同一学科中与学术领导者具有相同或基本相同观点的人形成的学术群体(School: a group of painters, writers, thinkers, etc. whose work is similar, esp. similar to that of a particular leader)。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界定学派为：一批人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对本学科内容所作的相关性的系统研究(School: group of writers, thinkers, etc. 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 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

上述对于学派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有几点共识:第一,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学术宗师;第二,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以及研究方法;第三,学派内存在着师承关系;第四,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四点为学派成立的标准,其中尤以师承关系以及共同的学术观点为学派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史学史上看,“学派”一词的产生基本上是近代西方的事情,现代意义的史学学派的形成也是较近的事,但是学派的研究却并不是最近发生,也并不仅存在于西方。学派的研究与学派的产生并不同步,在学派一词出现前,史学界已有学派研究之实,只不过当时不称为学派研究,而用学案一类的词。鉴于资料的有限性,我们对西方学派的研究情况不甚清楚,因此也不能从西方学派研究中得到更多借鉴,但这种缺失并不影响我们的考察,从中国古代有关学案的研究,我们将得到借鉴的楷模。本书在考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能否成立,成立的理由是什么时,即从中国学派形成条件出发,考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的师承关系以及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将眼光转向中国学案体裁的巨著《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明儒学案》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也不能反映学案各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这些作品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则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也正是从《明儒学案》开始,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研究。以后许多学科特别是历史、哲学学科都依据黄宗羲对学案的研究,来阐述论者自己要研究的学派。我们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加以研究,也基本

秉承《明儒学案》的研究思路加以论证。

这里我们研究学案，并不是对其中的某一具体学派具体思想进行研究，而是思考黄宗羲对《明儒学案》的思考、研究思路。他如何认为某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一派，论述是一派后，他又论述了什么。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没有直接阐明研究学案应如何进行，但在论述每个学案的背后，反映了其研究理论、构想、框架。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透过《明儒学案》每个学案的内容研究，来挖掘其背后的论证、写作思路，以此为我们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写作提供一个有据可依的论证模式。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采取“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在《师说》中，黄宗羲列出每个学案的宗主人物。在阐述每个学案时，基本依照这样的体系进行。先在每个学案前面提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列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罗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如以《崇仁学案》为例，完整的学案包括：（1）在初始的《师说》中列出案主吴与弼，指出吴与弼为明代朱学之大宗，其“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①；（2）在之后的《崇仁学案》案一复列吴与弼思想及有关著述，接着在《崇仁学案》案二、案三、案四分析中，分列各代表人物胡居仁、娄谅、谢复、郑伉、魏校等的思想。在论述每位代表人物的思想时，体例为：列出他们与吴与弼的师承关系；各代表人物的学术宗旨及与吴与弼思想的关系；选列代表人物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精华。

在这些论述中，黄宗羲最看重、每次都阐明的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1）师承关系；（2）学术宗旨；（3）代表人物思想个案。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是形成学派的起点；具有共同的学术要旨是学派成立的基础；各代表人物的论说及与案主的思想关系是检验学派学术要旨成立的关键和根本之点。

黄宗羲在介绍每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学术时，总是先指明他们与其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将其学术宗旨言简意赅地点出来，如《崇仁学案》说案主吴与弼“大要在涵养性情”^②；胡居仁则是“主言静中之涵养”^③；娄谅为“以收放心为居敬

①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10.

②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10.

③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23.

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①,魏校为“天根之学”,“天根,即是主宰,贯动静而一之者也”^②。其他《崇仁学案》人物的思想虽与吴与弼思想不尽一致,但主旨都与其思想相符合。

《明儒学案》这种著述学派的体例为我们论证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成立提供了明确的写作范例。据《明儒学案》,我们在论证完整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时,要阐明的问题有三:一要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渊源;二要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宗旨、核心思想;三要论述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

以下我们即本着这一思路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成立以及学派的主要思想。

二、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

(一)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学术渊源及师承关系

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渊源及师承关系,我们仍以《明儒学案》做参考对象。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论述各派的师承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形式。这里的师承关系既包括直接的受业,也包括由受业弟子再传弟子的间接受业情况。在以师承关系罗列学案代表人物时,黄宗羲将具有同一师承关系的归为一类进行论述。《明儒学案》有按不同时代人物的思想继承来说明师承,罗列个案的方式,如《明儒学案》的开卷《崇仁学案》。《崇仁学案》论述思想的师承关系以一代人接一代人这种方式进行,案一为吴与弼,案二为胡居仁、娄谅、谢复、郑侗、胡九韶,他们都师从于吴与弼,如胡居仁,他是“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③,娄谅,在求学多次未果的情况下,“闻康斋在临川,乃往从之”^④,而到案三魏校、余祐,则写他们是由吴与弼弟子胡居仁领入门下,魏校即是“私淑于胡敬斋”^⑤,以后的余祐也“往师胡敬斋”^⑥。案四的夏尚朴则“从学于娄一斋谅”^⑦,潘润也师事娄一斋。通过分析《崇仁学案》,可知黄宗羲的学案师承源流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无论直接受业还是通过弟子的间接受业,都可算作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8.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1.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21.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7.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1.

⑥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61.

⑦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63.

我们在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渊源以及发展脉络时,也以《明儒学案》这种方式来考察师承关系。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在《明儒学案》中,学派多以案主讲学研习的地名命名,如《崇仁学案》《白沙学案》,但也有以人名命名的学案,如《王门学案》。《姚江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大篇幅都以王阳明为中心来论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以《姚江学案》为起始,从总的方面论述阳明之学思想观点,同时又因王学各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按地域又划分了另八个王学派别,并进行分别论述。

按照这样的学派界定思路,我们在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时,也以杜威教育思想为源头进行阐发。20 世纪前半期杜威教育思想在世界各地流行,他的中国弟子传承了杜威学派的一个分支,即我们这里称呼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我们在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时,必以杜威的思想为起点进行论述。这里容易引起歧义的是,杜威乃美国的教育学者,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皆属中国人,将他们归为杜威学派似有不妥,但实际上,学派的划分是以地域、人名为主,并不以国别为主。这正如当时各地的各个研究阳明之学的学者形成自己本地的王门学派一样。我们也可将杜威、中国这两个术语冠到我们研究的对象上。

在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中,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了很长时间,1910 年,胡适在已获得康奈尔大学奖学金的情况下,毅然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受杜威直接指导,跟随杜威学习实验主义。胡适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多次自称是杜威的弟子。杜威来华时,他又翻译、阐述了许多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后人研究杜威在中国的情况,离不开胡适的翻译、理解。换个角度说,我们了解的杜威在中国的情况,大部分是胡适所表现出来的杜威。杜威走后,胡适仍不遗余力地宣传杜威的思想,秉承杜威的思想不逾矩。蔡元培曾说胡适之于杜威,“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所以胡氏可算是介绍杜威学说上最有力的人”^①。胡适自己也一向乐于承认自己是杜威的学生,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在《胡适文选》中介绍自己的思想,认为:“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②1936 年他为《胡适留学日记》写序言提到:“我在 1915 年的暑假中,发愤

① 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286.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4卷)[M].季羨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58.